

# 捷克民族復興運動之路

## ——十九世紀之於今日

鄭得興

### 一、前言

布拉格不僅是捷克的行政首都，更是文化精神的靈魂中心。但在歷史上，布拉格並不獨屬捷克人所有，14世紀盧森堡王朝之後，日耳曼（或德國）人逐漸佔據波西米亞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並與捷克貴族發生嚴重衝突，最終在1618年的三十年戰爭中，波西米亞（捷克）徹底淪為奧地利哈布斯堡的轄地，並受到嚴格的政治與宗教控制。18、19世紀奧地利的巴洛克藝術風潮雖改變了布拉格的城市風貌，但同時捷克的民族復興運動卻更深刻地扭轉了布拉格的文化內涵，捷克的文化民族主義悄悄地將「哈布斯堡王冠上最漂亮的珍珠」——布拉格，逐漸轉化／回復為捷克民族傳說中李布雪（Libuse）女大公所預言的「黃金搖籃」。

千年古城布拉格雖有許多美麗的稱號，如百塔之城、世界建築博物館等，但是真正屬於捷克人的布拉格，卻是透過19世紀民族復興運動的文化認同建構，才有今日的捷克文化論述。走在今日的布拉格古城裡，處處都是19世紀的歷史遺緒，而這些歷史記憶構築了今日捷克人的文化與國族認同。筆者認為，今日的布拉格可以從19世紀的文化復興視角切入，尋找今日捷克國族認同建構的歷史脈絡。19世紀的捷克文化復興運動，讓原本「石頭橋」的名稱改為「查理大橋」、販

馬的市集改為「溫徹拉斯廣場」、販牛的市集改為「查理廣場」；三大建築物「國家博物館」、「國家歌劇院」及「魯道夫音樂廳」都以新文藝復興風格設計，以此作為捷克文化復興的象徵；「帕拉斯基廣場」紀念捷克歷史之父帕拉斯基、「馬沙里克廣場」紀念捷克國父馬沙里克；伏爾塔瓦河的右岸，民族音樂之父史麥唐納的雕像佇立著，聆聽著自己的永恆作品「我的祖國」，舊城廣場上的胡斯雕像，取代了哈布斯堡的聖母柱，成為捷克民族「真理勝利」的國魂所在。

本文是一篇1618年至1918年有關捷克歷史的回顧，尤其是起於18世紀末，至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民族復興運動，這段捷克對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是形塑今日捷克國族認同的重要依據。布拉格歷史區域各個角落都有19世紀刻鑿的痕跡，但本文限於篇幅，並不計畫寫成一篇城市文化觀光的導覽指南。筆者主要以捷克的民族復興視角，來建構／解構捷克民族的文化認同，並再延伸探討其對今日捷克國家認同的意義。

### 二、三十年戰爭

就捷克民族復興運動而言，捷克歷史有二段重要時期，其一是「胡斯運動」（1415-1434），其二是「白山之役／三十年戰爭」（1620／1618-1648）。布拉格17世紀再度被魯道夫二世皇帝選

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所在，創造了布拉格繼查理四世之後的第二個黃金時代，不過1612年馬提亞斯（魯道夫二世的繼承人）將王室再度遷回維也納，他透過個人任命的方式派遣官員統治波西米亞，馬提亞斯反對宗教改革的立場鮮明，捷克新教徒的理想幻滅，波西米亞的教育系統受到宗教勢力干擾，許多學生選擇出國讀書，在波西米亞內因宗教對立的氣氛再起，不管是宗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人們通常需要選邊站。1617年斐迪南二世被選為馬提亞斯的王位繼承人，斐迪南二世一向以破壞非天主教徒聞名，他在捷克天主教派的支持下，首先廢棄「皇家詔令」，宗教衝突再次成為焦點，白山之役過後，波西米亞王國沒落，哈布斯堡家族在波西米亞的統治基礎變得十分堅強。

斐迪南二世對宗教的不妥協性逐漸逼迫捷克貴族採取激烈的抗議，1618年爆發「布拉格第二次擲窗事件」，結果導致1620年的白山之役，及往後一連串的宗教戰爭，長達三十年宗教戰爭期間，北方的新教國家與南方的天主教國家並不總是為宗教理念而對抗，其中也有政治因素，包括民族獨立的追求。1648年戰爭結束，參戰國簽訂西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歐洲恢復難得的寧靜，整體看來北方的新教國家似乎從宗教戰爭獲取較多的實質利益，荷蘭在此和平條約之後正式宣佈脫離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獨立，不過戰爭起源地的波西米亞卻遭受奧地利哈布斯堡的更嚴加控管，戰爭期間的人力及財產損失難計其數，最要緊的是戰後波西米亞的知識菁英被迫放逐異國，造成波西米亞文化發展上的重大遺憾。

白山之役後，哈布斯堡對波西米亞採取高壓統治，天主教勢力空前強大，斐迪南二世及其繼任者斐迪南三世聯手讓波西米亞僅僅成為其統治

的附屬地，捷克貴族被迫噤聲不語，遭受迫害的貴族其財產土地遭受沒收，這些錢財成為哈布斯堡戰爭期間的經費來源，土地也成為哈布斯堡在戰後分配給戰爭有功者與親哈布斯堡者的酬庸，波西米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發展進入黑暗期。三十年戰爭期間，波西米亞不僅常成為作戰之地，也常成為兵源及稅收的主要提供者，波西米亞各方面都逐漸喪失主體性。儘管哈布斯堡專制王權的統治越來越嚴厲，不過此時啟蒙運動及理性主義思潮也開始影響哈布斯堡統治的區域。18世紀40年代以後在哈布斯堡開明專制的治理下，結果成為從18世紀末起捷克民族復興運動的重要源頭。

三十年戰爭不是一場延續不斷的戰伐，而是很多場打打停停的戰役總和。三十年戰爭也不是單獨二國的對抗，而是舊教集團及新教集團在不同時點的捉對廝殺，三十年戰爭更經常不是為了維護神聖的宗教因素而戰鬥，而是各方政治及經濟利益的攻略。不過三十年戰爭可說是歐洲最後一場的宗教戰爭，戰爭本身可分為四個時期：波西米亞—帕那丁那特（the Bohemian-Palatinate，1618-1623）；丹麥戰爭（the Danish War，1625-1629）；瑞典戰爭（the Swedish War，1630-1635）及法國—瑞典戰爭（the Franco-Swedish War）。<sup>1</sup>

戰爭起源地在波西米亞，波西米亞有著悠久的新教抗議精神，從15世紀初胡斯運動起，胡斯的宗教改革精神在波西米亞未曾間斷過。16世紀的馬丁路德及喀爾文的宗教改革與胡斯宗教改革精神相結合，促使波西米亞的捷克貴族與哈布斯堡統治者間更顯得格格不入。斐迪南二世不斷壓制非天主教徒，致使捷克貴族擔憂喪失特權。1618年憤怒的捷克貴族來到布拉格皇宮將哈布斯堡二位國王代表的官員擲出窗外，是謂「第二次

布拉格擲窗事件」(Defenestration of Prague of 1618)，該事件的發生也意味著捷克貴族與哈布斯堡王朝的全面性決裂。

捷克貴族自己組成議會，並於1619年7月開會決定罷免斐迪南二世的波西米亞國王身份，並另外選出帕拉丁那特的弗列德里克(Frederick of the Palatinate, 1619-1620)擔任波西米亞國王，捷克貴族的主要考量是認為其妻為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的女兒，捷克貴族希望能藉此獲得英國的支持。自從斐迪南二世加冕為波西米亞國王以來，捷克貴族不停地與之對抗，擲窗事件代表著捷克貴族必須積極尋求外援，以準備應付一場不可避免的衝突，除推舉弗列德里克擔任國王之外，捷克貴族也希望能與新教集團國家(英國、瑞典、荷蘭、部分日耳曼地區的公國等)結盟，以能裡應外合地應付哈布斯堡。

1619年捷克貴族開始主動攻擊哈布斯堡的奧地利領地，不過1620年由於巴伐利亞與薩克森二國軍隊加入斐迪南二世的陣營之後，局勢馬上改觀。1620年11月8日在布拉格近郊的白山(White Mount或Bila Hora)雙方進行第一場決定性的大會戰，結果波西米亞軍隊不到二小時即潰敗四散，弗列德里克聞訊後立即啟程逃離波西米亞，因其擔任國王的期間相當短暫，而被譏稱為「一冬之王」。

白山之役結束後，斐迪南二世立即展開報復行動，首先逮捕27位叛變領袖，於1621年6月21日在布拉格舊城廣場處決，並將其中十數位的首級懸掛在查理橋塔上以示眾警告，之後沒收在摩拉維亞、西里西亞及波西米亞叛變者的財產。1627年頒發「新土地憲章」(the Renewed Land Constitution)，規定不願改宗信仰天主教者必須搬離捷克地方，該憲章並宣稱波西米亞王位屬於哈布斯堡的繼承財產。此時不願改變宗教信仰的捷

克人別無選擇，只能離開家鄉，在這些被迫離開家園的人當中，有一位是摩拉維亞兄弟會的最後一位主教考門斯基(Komenský或康明紐斯Comenius)，在他流浪他國期間，不斷從事教育工作與著述，他的教育理念影響現代教育的形成，他拒絕英國及美國哈佛大學的禮聘，只因為他不願離開祖國太遠。

1625年丹麥國王克里斯提恩四世(Christian IV)率軍攻打哈布斯堡軍隊，此時哈布斯堡陣營出現了一位善戰的軍事首領華倫斯坦(Valdštejn或Albrecht of Wallenstein)。他原先是摩拉維亞兄弟會的貴族，但三十年戰爭一起，他改宗信仰天主教並開始招募傭兵。1625年他已徵得一支7萬名左右的軍隊，並在1626年於德紹(Dessau)大敗丹麥軍隊。不久之後華倫斯坦不斷地打勝戰並獲得斐迪南二世的賞賜，1629年華倫斯坦與丹麥簽訂呂北克(Lübeck)條約後，即進入下一個階段一對抗瑞典軍隊。華倫斯坦的英勇善戰是哈布斯堡能立於不敗，或者起碼能夠挺得住不被新教集團瓦解維也納政權的基本保障。

1630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II Adolphus)結合布萊登堡(Brandenburg)與薩克森，打敗哈布斯堡的軍隊，後來斐迪南二世再度重用華倫斯坦，將瑞典軍隊驅離波西米亞，1632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不幸戰死。許多白山之役之後被驅逐出國的捷克人，他們在薩克森及瑞典積極地鼓動當地的統治者與華倫斯坦合作，華倫斯坦的戰功相當高，又因他自己是出身於摩拉維亞，所以斐迪南二世並不完全信任他，三十年戰爭期間華倫斯坦數度被迫下台，但哈布斯堡宮廷每次在面臨新的強大敵軍之際，都會再度重用華倫斯坦。1634年當華倫斯坦在前線黑柏(Cheb)作戰之際，突然被斐迪南二世所派遣的殺手暗殺於住處。華倫斯坦死後，被放逐的捷克

人士大失所望，他們喪失了一次回歸及復興波西米亞的機會。

1639年起，瑞典軍隊捲土重來，不僅入侵布拉格，也一路往南前進，1643年入侵摩拉維亞大城布爾諾（Brno），瑞典軍隊並與法國軍隊合作共同侵擾波西米亞，此時這些入侵波西米亞的軍隊開始進行財物掠奪，瑞典軍隊將布拉格城堡內魯道夫二世的收藏品運走不少。三十年戰爭的後期，新教集團主要是由瑞典軍隊與哈布斯堡對抗，不過很明顯的是不論舊教集團或新教集團，都無足夠的力量在戰爭中取得關鍵性勝利，三十年戰爭的結果雙方簽署了西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其中確定「誰統治就由誰來決定宗教」（Whose the rule, his the religion）原則。如此一來，波西米亞的天主教信仰又再一次受到確認。於是1648年當戰爭結束之後，波西米亞又形成另一波逃亡潮，其中重要的人物包括捷克歷史學者史卡拉（Pavel Skála）、前往倫敦的畫家賀拉爾（W. Hollar），在波羅的海附近居住的賀黎克（J. Holík）等。

三十年戰爭期間，哈布斯堡王朝主要歷經二位國王，除了斐迪南二世之外，另一位就是他的兒子斐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 1637-1657）。這二位國王對待波西米亞領地的態度都是一樣的，他們沒收新教貴族的財產，藉由德語的廣泛使用推廣日耳曼文化，確定天主教的優勢地位，波西米亞的新興貴族藉由支持哈布斯堡而獲得一些經濟與社會的特權，不過也同時失去了宗教自由與政治地位。三十年戰爭期間，波西米亞及摩拉維亞地區的人口大約減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人口又大致淪為貴族的農奴，一般人民的生活相當辛苦。三十年戰爭之後，波西米亞失去獨立地位，更進入一段政治黑暗期。

### 三、「黑暗時期」

三十年戰爭之後，宗教因素已很難再成為國際衝突的引爆點，各國統治者可以自行決定其國內的宗教信仰。西伐利亞和約同時也確定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大致國界，舊教國家的抗議份子紛紛被迫離開祖國，這些信仰新教的抗議份子有許多是高級知識份子，他們在戰後紛紛遷往英國、荷蘭、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及德國北部的的新教國家，在那裡他們的思想及知識貢獻可以受到保護，這些新教地區進一步促使了啟蒙運動的發展與推廣。反觀波西米亞則進入了「黑暗時期」（time of darkness），黑暗時期指的是波西米亞獨立性的喪失及文化的破壞。

哈布斯堡王朝在戰後處理波西米亞，主要是在政治上將其視其為行政單位之一，逐漸取消波西米亞作為王權的地位，代替以中央行政的管理方式。文化上哈布斯堡規定德語為官方語言，行政事務的處理及教育事業的推廣都加深了德語使用的普及化，三十年戰後哈布斯堡所扶持的眾多小貴族，都成為德語的主要推廣者。都市居民逐漸習慣以德語為日常生活語，惟在鄉下地區的捷克農民仍以捷克語為主要溝通的話語，鄉下的捷克語成為18世紀末起捷克民族復興運動最重要的文化資產。

三十年戰爭過後，重要的經濟負擔又落在農民身上，農民依附封建主的情況仍未改善，尤有甚者農民幾乎都成了農奴，他們負責為封建主耕種的時間不斷加長，農民暴動的事件此起彼落。李奧波得一世（Leopold I, 1657-1705）又再次確認了封建主的應有權利，結果引發農民大暴動。在平息暴動之後，李奧波得一世開始將封建主與農民的關係明確化，之後的統治者基本上都得處

理農民問題，直到啟蒙運動起，為因應國家發展及釋放人力的需求考量，農民的自由權利才逐步開放。

李奧波得一世時期波西米亞發展了巴洛克建築與巴洛克式的音樂，但他並不鼓勵提倡波西米亞文學，原因是建築與音樂可以展現帝國的統治政績，但思考性的文學容易危及統治權。白山之役後，耶穌會再次回到波西米亞，重新掌控宗教意識型態的主導權，透過教學與傳教工作，新一波的再天主教化於1680年左右完成。不過政府仍擔心新教的秘密傳播，尤其是胡斯精神在波西米亞的根深蒂固，於是1729年哈布斯堡王朝創造了一段聖人傳說內波穆斯基（Sv. Jan Nepomucký），其目的是為了對抗捷克的胡斯精神。<sup>2</sup>

三十年戰爭期間，土耳其並未趁機加入歐洲的混戰行列，不過1663年土耳其與哈布斯堡的衝突再起，此時哈布斯堡也與法國國王路易十三仍有糾紛，不過哈布斯堡在不久之前已征服匈牙利，李奧波得一世在法國歐根親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的協助下擊退土耳其，在對抗土耳其入侵期間，波西米亞不斷出錢出力。1700年之後，哈布斯堡主要與法國互爭西班牙的王位繼承權，此時哈布斯堡的西班牙旁支勢力不斷衰退當中，當李奧波得一世的兒子約瑟夫一世（Joseph I, 1705-1711）繼位之後，國際局勢已漸漸改觀，哈布斯堡已退回至中歐的勢力範圍。約瑟夫一世死後，其兄弟查理六世（Charles VI, 1711-1740）即位，他最關心的主要課題是如何維持哈布斯堡在中歐的霸權地位。除此之外，他還關心王位繼承問題。

查理六世於1731年提出他的繼承權修正方案，他主要目的是想確保其子孫能永續繼承王位，而不是由他的兄長約瑟夫的子嗣來繼承。他嘗試將王位傳給長女泰瑞莎（Maria Theresa），

但過程並不順利。他提出新繼承法案，其中規定如無男嗣可傳，可傳女。1720年首先獲得奧地利、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及西里西亞貴族的同意，他有意讓國際間也能認同他的作法，於是他也努力獲取各國對該繼承法的承認。1726年至1732年間，該項繼承權修正法案陸續獲得西班牙、英國、普魯士、荷蘭的正式同意，不過在獲得法國的同意上卻是以部分領土的喪失為代價。

當查理六世在爭取繼承法的同意過程中，波西米亞相當盡力協助，波西米亞貴族想藉此努力來恢復獨立地位，不過查理六世仍對波西米亞採取高壓的統治政策，他透過天主教的勢力再一次迫害民間殘存的新教思想，耶穌會教士柯尼阿許（Koniáš）自豪地宣稱他燒毀了6萬冊捷克「異教徒」的書籍，許多非天主教徒仍遭受迫害。1740年查理六世過世，依據新的繼承法，查理六世的長女泰瑞莎繼承哈布斯堡的王位，成為哈布斯堡有史以來唯一的女性統治者。

#### 四、開明專制

宗教的狂熱與不理性在三十年的宗教戰爭之後有了深刻反省，十六世紀之後，歐洲的地中海貿易時代漸漸轉向大西洋的冒險活動，重商主義與殖民主義隨之擴展開來，科學的實用性成為挑戰傳統與宗教的利器，然而傳統與宗教的羈絆性仍舊存在於擁有王權的統治者當中。不過，在國際競爭上，科學的推廣已成為國家邁向富強之道，為解決仍方興未艾的專制王權統治基礎，統治者惟有先讓自己「啟蒙」（enlightenment）。之後，再透過專制君主的力量推廣啟蒙運動的各項工作。

開明專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的改革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成長，代表人物包括普魯士

的斐列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俄國的凱賽琳二世（Catherine II）、奧地利的泰瑞莎與約瑟夫二世（Joseph II），他們都瞭解到不這樣做，根本就趕不上英國及法國的急速發展，而之所以要進行啟蒙運動的改革，並不是有心要啟迪人民的心智，而完全是為配合加強王權並使國家更具競爭力之故。但隨著啟蒙運動的推廣及深化之後，就不是開明專制的君主們再用政治力所能控制，人民的理性力量抬頭，並逐漸反對專制君主及封建貴族的不合理性，18世紀的啟蒙運動成為19世紀民族復興運動的醞釀期。

泰瑞莎女王於1740年繼位為新王，雖然其父查理六世在身前已為泰瑞莎掃除若干繼承障礙，但當泰瑞莎一繼位，立刻遭到一些國家的挑釁。1740年12月普魯士侵入西里西亞打敗奧地利軍隊，1742年在柏林條約中普魯士國王斐列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獲得全部西里西亞地區。隨後巴伐利亞及法國於1741年聯手攻打布拉格，同年12月巴伐利亞君主阿爾貝特（Charles Albert）自行宣布任波西米亞國王，並獲得部分貴族的效忠，幾個月後他又被選任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不過隔年（1742）當法國軍隊退出波西米亞之後，阿爾貝特也結束了他的波西米亞國王，他的任期不比「一冬之王」長。泰瑞莎繼任之初，連番受到周邊列強的欺侮，波西米亞一些貴族及農民甚至支持他國對抗奧地利。泰瑞莎獲得匈牙利的協助，逐步將失去的地方收復，1743年驅離法國及巴伐利亞軍隊之後，泰瑞莎在布拉格城堡的聖維特教堂加冕為王，他雖然寬赦波西米亞貴族的反叛行為，不過從此波西米亞便無法得到如同匈牙利那般的諸多禮遇了。1744年泰瑞莎集中全力欲將普魯士驅離西里西亞，不過隔年仍無功而返。

1756年普魯士首先開啟七年戰爭，普魯士

軍隊穿越過薩克森，之後再踏過波西米亞平原進而圍攻布拉格。1757年奧地利一場對普魯士的決定性勝利後，普魯士軍隊暫時撤退，不過1758年及1759年又再度攻擊摩拉維亞，哈布斯堡在俄國的協助之下，擊退普魯士。俄國女皇伊麗莎白死後，彼得三世即位，他崇拜普魯士國王斐列德里克大帝，於是1762年俄國軍隊撤出，泰瑞莎無法獨立支撐對普魯士的對抗，終於在1763年承認普魯士在西里西亞的完全地位。哈布斯堡失去西里西亞之後，在「捷克」所剩下的統治區域僅剩下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及一小部分的西里西亞，這個領地範圍一直維持到一次大戰結束，甚至到今天所呈現的捷克樣貌。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及普奧七年戰爭爆發衝突的地方大多是在波西米亞境內，戰爭的結果造成波西米亞的巨大損失，除了領土的割讓之外，波西米亞的農民及新興的城市工人更承擔著國家稅金的主要來源，波西米亞單獨承擔了哈布斯堡32%到49%的稅收。泰瑞莎改革思想的原動力是來自法國的理性主義，而開明專制是其實現改革的重要哲學依據，目的是在提高其統治管理的效率，具體的作法為改善稅收制度及加強中央政府的行政革新。1748年波西米亞貴族同意提高稅金，也是同一年象徵波西米亞王權的宮廷被取消，代之而起的行政機構為新總督的管理體制，波西米亞此際更如同一個地方行政單位。然而，匈牙利的貴族政府體制仍繼續維持其固有的地位。

西里西亞的喪失對哈布斯堡而言，損失不可謂不大，但對波西米亞而言卻是一個轉折契機，哈布斯堡將類似西里西亞地理及自然資源條件的波西米亞北部建設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區，波西米亞的手工藝產品及紡織工業產品成為18世紀中葉以後的出口大宗。西里西亞原為哈布斯堡工業建

設的重點地區，如今被普魯士奪走，也成為普魯士後來工業興盛的重要因素，這片廣大工業地區的通行語言為德語，如今脫離與波西米亞的連結，結果造成波西米亞（全捷克地區）的捷語人口比例高於德語人口。雖然波西米亞的工業取代西里西亞的發展，不過波西米亞境內仍以農民人口居多，泰瑞莎贊成以國家行政的力量來干涉封建主與農民的關係，尤其她反對封建主不理性的欺壓人民，封建主不當的壓榨農民，結果造成多次的農民暴動。1775年的農民暴動更威脅到布拉格，不過當暴動平息後，大部分參與暴動的農民都被赦免。之後，為因應工業的興起及工業人口的需求，解放農業人力成為必須面對的課題。

泰瑞莎的啟蒙運動改革中有關現代教育的設置及義務教育的普及化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現代基礎教育的推廣重點之一在於德語的教學，而德語的學習被視為是行政現代化及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並視為是同化政策的重要措施。1774年公佈「一般教育條例」（General School Ordinance），在每一教區都設置有基礎學校，教導歷史、幾何、繪畫及德語等。1773年泰瑞莎解散耶穌會，將耶穌會的財產部分移作教育用途，同時也藉此將宗教的行政移至國家的管控之下。1765年泰瑞莎的大兒子約瑟夫二世與其共同執政，在前一年泰瑞莎順利協助約瑟夫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雖然約瑟夫若干啟蒙見解不同於泰瑞莎，不過仍助其完成多項啟蒙的改革，耶穌會的解散被視為約瑟夫二世的運作結果。

約瑟夫二世在西元1780年正式即位為哈布斯堡統治者，他的開明專制更基於實用性與功利性，也更深具中央集權主義特性。1781年，他公佈宗教寬容法案，路德教派與喀爾文教派是在宗教寬容之列，東正教也有適度的規範，但該法卻排除捷克的兄弟會。約瑟夫二世也解除對猶太人

的若干限制，包括貿易條件放寬，允許自由選擇住處，廢除只能穿著特定服裝的規定。約瑟夫加強對教會的行政管理，並透過國家的教育系統培養教士，廢除修道院的社會救助功能，將許多教堂及禮拜堂移為世俗用途，並減少宗教節日。1781年約瑟夫二世公佈法案廢除農奴制度，允許農民自由離開土地，不過農民仍須付予封建主一定的稅金。約瑟夫的改革也受到封建主的反抗，同時有許多地方也受到農民的不滿，在他執政晚期所面對的經濟與軍事危機時，他的許多改革都被廢棄掉。

嚴格說來，約瑟夫二世並不具有革命性，他的啟蒙改革仍植基於功利性的目的，一旦改革遇到困難或危機時，改革就無法有效的貫徹。另一方面，開明專制的改革也具有二面性，一方面開明的結果具有正面性，例如解散耶穌會，寬容若干不同教派的發展。另一方面專制的結果仍有若干破壞性，許多教堂及修道院被迫關閉之後，許多教堂內部的藝術文化珍寶也同時被毀壞。約瑟夫特別注重德語的使用，在他的觀點看來，德語是最適合中歐國家共通使用的語言，但他卻忽略了在帝國內部諸多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情緒。約瑟夫的改革，更加強各民族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啟蒙運動的精神逐漸推演成民族的自覺運動與民族文藝復興運動，這或許是約瑟夫二世所始料未及的。

1787年約瑟夫二世與土耳其作戰，但在1790年於前線生病過世。其弟李奧波得二世（Leopold II, 1790-1792）繼位，他對啟蒙改革的興趣是在他擔任托斯卡尼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的時候開始，他繼位為哈布斯堡國君之後即熱烈地開展各項改革。首先他先與土耳其簽訂停戰協定，致力恢復國內秩序；為獲得波西米亞人的支持，1791年9月前往布拉格城堡加冕為波西米亞

國王，他贊成布拉格大學（查理大學）可以使用捷語教學；他取消約瑟夫二世所造成爭端的土地稅；他引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的權利；他甚至增加農民及城市鎮民在地方議會的代表性。

李奧波得二世在位僅有二年，哈布斯堡的開明專制政策也在李奧波得二世過世後停止。1792年他的兒子法蘭西斯二世（Francis II, 1792-1835）即位之後，因為當時歐洲關心的焦點都投注在法國大革命的後續發展，法蘭西斯二世的態度轉趨為保守，再加上他的能力明顯不及前幾任國君，所以也終止了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進步發展。不過經過泰瑞莎、約瑟夫二世及李奧波得二世的啟蒙改革運動，波西米亞的現代化建設有了最佳的基礎，同時在18世紀末期時，波西米亞已在幾十年的啟蒙思想醞釀下，出現了早期民族復興運動的重要人士，18世紀的啟蒙運動成為19世紀捷克民族復興運動最重要的前期準備。

## 五、民族復興運動

捷克啟蒙運動起於18世紀末，由於哈布斯堡推行日耳曼化運動，規定德語為官方語言，並盡量消除波西米亞的傳統文化因素，結果卻刺激了捷克民族意識與民族復興運動的興起。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捷克開始「民族復興運動」，民族復興運動者最初的努力是希望能提昇捷克語的地位以及形塑捷克文化，並追求從17、18世紀以來所失去政治認同之下的捷克文化之解放及民族的復興。但19世紀初情況並不有利，19世紀初拿破崙打敗哈布斯堡之後，哈布斯堡的獨裁者反而壓抑波西米亞的民族解放運動，即使1848年的革命年代捷克民族復興運動的領導人提出政治需求的願望亦不可得，他們呼籲哈布斯堡進行聯邦原則的

改革及重視斯拉夫民族的權利，1849年哈布斯堡在摩拉維亞Kromeriz召開帝國會議，會中討論制憲議題但也同時通過制裁反對人士的嚴格措施，並抵制若干文化復興機構的活動如布拉格國家博物館。

然而1849年至1859年政治上的鎮壓氣氛卻沒有阻礙到經濟活動，19世紀末捷克已經成為中歐地區最工業化的地區之一，知名者如Vitkovice的冶鐵、Plzen的Skoda汽車製造廠及Plzen城市的釀酒業。此外，製糖也成為此時期捷克工業的驕傲，連接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及其他歐洲或捷克地區個別工業區域的鐵路網也四處密佈，除了布拉格之外，Ostrava及Kladno區域（煤礦及冶煉）、Brno（機器器材）、北波西米亞（水晶）及東北波西米亞（紡織品），19世紀末Krusne山腳下的工業快速發展（煤礦業及化工業）也伴隨著鄉村地區的沒落同時進行。

1860年哈布斯堡皇帝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f）正式放棄專制主義並開始市民社會的建設，波西米亞開始恢復政治的參與，1861年的二月憲法公佈並規定了首度舉行國會選舉的基礎，波西米亞出現了政黨，歷史學者帕拉斯基（Frantisek Palacky）及其女婿李格（Frantisek Ladislav Rieger）組織老捷克黨，另外一個較激進的政黨年輕捷克黨於1874年成立，不過這二個政黨經常合作復興捷克國家地位及努力欲將哈布斯堡王朝體制轉型為聯邦制。

1866年普奧戰爭在波西米亞的Hradec Kralove爆發，結果奧地利戰敗，1867年維也納當局向匈牙利讓步而將先前中央集權的帝國改為奧匈二元帝國，波西米亞的政治人物因此受到鼓舞而欲爭取奧匈波三元帝國的可能性，不過受到匈牙利的極力反對而使得波西米亞的希望破滅。捷克的經濟及文化快速發展，卻爭取不到應有的政治地



位，於是捷克政治人物不斷改變策略直到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獲得國家獨立的地位。

19世紀最後10年捷克社會已經具備了現代化社會的所有特徵，1890年之後的政黨除了原有的老捷克黨及年輕捷克黨之外，尚有1878年成立的屬於勞工階層的「捷克斯洛伐克社會民主黨」、民族社會黨、農民黨、另有雖是小黨但卻具有很大影響力的現實主義黨，其領導人是馬沙里克（T. G. Masaryk），1907年舉行首次的普選，結果由農民黨及社會民主黨獲得大部分的選票。

在文化領域方面，浪漫民族主義自從民族復興運動以來即在傳統上佔有優勢，甚至在1900年之前現代化運動及個人在工業科技的情境下開始衝擊到捷克藝術。同時捷克的文化開始面向全世界並獲得很大的成功，特別是音樂（Antonin Dvorak及Leos Janacek）及繪畫（Alfonse Mucha），布拉格也成為新藝術的代名詞。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皇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遭暗殺，結果爆發第一次大戰，歐洲舊制序被打亂，而新秩序不斷形成，不同社會團體也抓住此機會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婦女在許多就業職場上替代男性工作者，政治激進團體也不斷藉助戰爭擴充勢力，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為此例。這些戰時的變化也深刻影響中歐及南歐地區，德國戰後變成一個共和國，奧匈帝國戰後則分解為許多的民族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則為其中之一。

戰前捷克人無法取得完全的政治獨立地位，戰前奧匈帝國的領地逐漸引起德國及俄國的覬覦，奧匈帝國已無力處理諸多糾紛而必須仰賴德意志帝國，特別是在戰爭期間，捷克人民不斷遭受破壞，致使捷克人與奧匈帝國的關係迅速惡化。後來捷克的希望藉助在馬沙里克所領導的「海外行動」（action abroad），馬沙里克組織

海外僑民對抗奧匈帝國並希望獲得其他國家支持捷克獨立的想法，他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國家會議」（National Czechoslovak Council），後來社會學者貝奈斯（Edvard Benes）及斯洛伐克天文學家、同時也是法國飛官史帖凡尼克（Milan Rastislav Stefanik）也加入馬沙里克的行列，他們成立一些軍事單位，成員包括捷克人（少數斯洛伐克人）、戰犯及不願參與奧匈帝國作戰的逃兵，在法國、義大利，最主要的在俄國都有成立了捷克兵團，尤其在俄國的捷克兵團，他們甚至控制了西伯利亞鐵路。

西方國家一直不願正面回應「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議會」的訴求，起初，他們仍存有一些幻想希望仍維持哈布斯堡來對抗德國，不過巴爾幹半島國家因為受到俄國的二月革命鼓舞，而不斷興起民族運動，他們感受到舊帝國的潛在弱點，也希望爭取獨立的國家地位並作為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捷克國內根據1911年的普選，各政黨所獲得的得票比例派遣代表組成「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並從1918年起「國家委員會」逐步扮演國家機器的協助角色。哈布斯堡末代皇帝卡爾（Karl）擔心引爆內戰，同時他也要求剛成立的捷克國家仍能留在哈布斯堡國家內，不過這些希望都已不可能。1918年10月27日奧匈帝國外長Julius Andrássy寫信告訴美國他們承諾承認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國家的權利，捷克國家委員會此刻已經感受到時間已經到來了。10月28日國家委員會接管了許多政府辦公室，中午時分他們在溫徹拉斯廣場正式宣佈國家獨立。不過國家委員會的成員都清楚獨立並不只是宣告這回事，還需要讓國家能夠正常運作與維持。戰後中歐一片混亂，隨時都有革命的危險，新國家最重要的事務即是能穩住秩序及維護國家財產，透過「國家委員會」的運作及全國人民的

共體時艱，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秩序很快就已能穩定維持。

捷克剛獨立之時的最主要問題是邊境問題，戰後許多德國人仍居住在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及西里西亞的境內，德國及奧地利也想藉由民族自決的原則將這些地方納入自己的國土管轄，當捷克國土有遭分裂之疑的同時，戰勝的西方國家已沒有興趣再去協調中歐的糾紛。德國在1918年11月及12月甚至派遣軍隊佔領德捷邊境若干地區，1919年3月4日奧地利國會開會時，在邊界地區也造成地方民眾與軍隊的衝突，結果造成50幾人死亡。Tessin附近的邊界也有爭議，波蘭宣稱擁有這裡的主權，協議與軍事衝突都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最後在強國的介入調停之下，這個區域以平分收場。

捷克國內與海外的政治人物都認為與斯洛伐克共組國家是必要的，斯洛伐克的代表也能同意與捷克共組國家來維持斯洛伐克的特色，斯洛伐克在19世紀末是屬於奧匈帝國的匈牙利部分，並遭受嚴厲的匈牙利化。1918年5月30日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流放份子共同決定共組國家，但須維持斯洛伐克的自主性，斯洛伐克的國內代表也在1918年10月30日的馬汀（Martin）宣言中贊成與捷克共組國家，但是贊成這項決議的人卻無權力來執行，1918年11月4日「國家委員會」任命一個臨時的斯洛伐克政府，由斯洛伐克政治人物Vavro Srobar來領導，起初Srobar無法克服舊勢力及匈牙利軍隊的阻擾，他只能藉由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的協助來宣稱他的代表性，1918年及1919年之交才成功地將斯洛伐克境內情勢穩住。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也納入路德尼亞人（Ruthenian people），並在列強的同意下將次喀爾八阡山（Sub-Carpathian Ukraine）納入捷克斯洛伐克領土。捷克斯洛伐克的邊界在一些和平條約中受到

確認，包括1919.6.28的凡爾賽合約、1919.9.10的聖澤曼（Saint-Germain）條約、1920.6.4的特里農（Trianon）條約，基本上，戰勝國都還能滿足捷克斯洛伐克所提出的需求，捷克斯洛伐克也相當支持一次大戰後所建立的凡爾賽國際體系。

## 六、十九世紀之於今日的捷克

捷克在歷史上曾有過輝煌的歷史，13世紀的歐塔克二世（Otakar II）及14世紀的查理四世（Karel IV），都是波西米亞王國版圖奠基的重要國王，但過去的國家（state）體系不同於19世紀的民族（nation）復興運動下的建國（nation-state building）目標。中古封建時期的貴族議會主要考量的是貴族利益，人民是臣民，是附屬於封建主的財產，甚至國王的位置並非一定要由本族人擔任。18世紀末波西米亞因為哈布斯堡一連串現代化運動的挫折下，而獲得了民族復興的機會。19世紀是捷克人／捷克性（Czech-ness）建構的關鍵時代，捷克的現代化是藉由日耳曼化逐步實現，但捷克的文化復興則是藉由去日耳曼化而完成。

19世紀捷克的民族復興運動是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走到鄉村裡找尋捷克語言，他們從古籍裡整理出捷克的民族傳說，他們寫下自己的史詩、唱出自己的歌謠、創作自己的生活小說。捷克民族17世紀的國家挫敗，是國族的創傷，是捷克歷史的黑暗時期，但捷克民族並未自我放棄，而是在等待機會。哈布斯堡18世紀的國力下滑，導致開明專制、日耳曼化及現代化的改革，卻造成捷克工業、教育等現代基礎的建設，捷克民族在這世紀不斷積累民族復興的能量。17世紀及18世紀是捷克19世紀民族復興運動的前置準備期，因此，要深入了解捷克的國族建構

史，至少要回顧1618年至1918年這三百年的歷史。

20世紀的捷克國族建構歷經二次大戰納粹德國，及冷戰共產蘇聯的挑戰，國家的存在並不完整。1989年絲絨革命後，民主政體的回復，捷克力圖加入國際組織以使國家人格更加鞏固，但回歸歐洲之後的捷克，因對歐洲的懷疑（Euro-skepticism）反而更強化了捷克人民的國家認同。19世紀建構的捷克圖像／意象，是今日捷克人民的想像共同體。不過隨著全球化、市場化的推進，布拉格又成為國際重要的觀光城市，今日的布拉格是捷克人的，也是全地球人的。二次大戰之後，捷克總統貝奈斯可以驅逐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300百萬德國人。冷戰期間，捷克可以封鎖國界，不讓外國人進入。今日的捷克是歡迎更多的國際觀光客進入消費，並認識捷克的歷史與文化。不過，今日的捷克樣貌，基本上還是19世紀的延伸！

## 參考資料

Agnew, Hugh. 2004. *The Czechs and the 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Cornej, Petr & Pokorny, Jiri. 2004.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to 2004*. Prague: Praha Press.

Dowling, Maria. 2002. *Brief Histories: Czechoslovakia*. London: Arnold.

Leff, Carol Skalnik. 1997.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Nation Versus State*. USA: Westview Press.

Meyer, Holt. 1997. *Reviewed Work(s): Questions of Identity: Czech and Slovak Ideas of Nationality and Personality by Robert B. Pynsent*.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41, No. 1. 140-147.

Musil, Jiri. 2000.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Panek, Jaroslav & Tuma, Oldrich. 2009. *A History of the Czech Lands*. Prague: Karolinum Press.

Polisensky, J. V.. 1991, *History of Czechoslovakia in Outline*. Prague: Bohemia International.

Wandycz, Piotr S., 1992. *The Price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 註釋：

1. 參考Hugh Agnew, “The Czechs and the Lands of the Bohemian Crown”, 2004, California
2. 內波穆斯基（Sv. Jan Nepomucy）的民間傳說是因為他在擔任布拉格代理主教時，因堅持不向國王透露王后向其告解的秘密，而遭受國王溫徹拉斯四世遣人將其丟下查理橋使其溺斃，當晚在其遇難之地上空眾星雲集。實際上，這是一段政治與宗教衝突的歷史，溫徹拉斯四世在得不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帝位後，對天主教採取眾多反擊的措施之一。不過聖內波穆斯基的堅持不語，也成為波西米亞異議人士所效法，畢竟在這段黑暗時期，還是噤聲不語的好。